



思想與運動的交匯處

WWW.REIGNITEPRESS.COM

对话陈敬慈： 佳士运动与进厂学生 应重新调整步伐

怀火专访陈敬慈

2019/5/30

佳士工学运动 X 中港台左翼回响专辑

潘毅、陈敬慈、杜继平、大陆组织者等专访将陆续推出
更多专辑文章请见www.reignitepress.com

“怀火” 编案：

佳士运动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罕有的以共产主义为想象的工人—学生连结运动。然而，批评的声音自 2018 年夏天运动起始不久后便在，最近因为官方的新一波打压，对于佳士运动的批评再次集中涌现。“怀火”作为立足当下关注中国大陆历史、现实及左翼实践的平台，希望为观察、分析佳士运动提供具思想浓度的对话平台。我们整理了半年多来来自大陆马列毛派、托派及港台左统派的批评观点，邀集几位大陆、香港及台湾左翼思考者、实践者对这些批评进行集中回应，从多方理论视角、实践位置呈现当前阶段对于佳士运动的反思。我们亦期待更多读者来稿回应，展开进一步讨论。

访谈日期/2019 年 5 月 22 日

访谈地点/香港中文大学

如何看待佳士运动的性质？

怀火：陈老师你好，你从去年夏天佳士运动开始后不久就一直在关注，其间写过两篇关于佳士的文章，我们也参加了你去年底关于佳士的一场对谈，认为你对这次运动有很多不同层面的具体分析。

你去年八月写的一篇文章〈从佳士事件看中国工会改革的结构性矛盾〉¹，谈的就是关于工会的具体问题。可否首先从佳士作为以组织工会为诉求的运动

¹ 陈敬慈（2018）〈从佳士事件看中国工会改革的结构性矛盾〉，见“端传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831-opinion-chenjingci-trade-union-js/>

这一层面来谈谈？

陈敬慈：2010年的富士康事件和本田罢工后，大家对工会改革的认识和要求有所提高，工人要求组织工会并不罕见。过去很多的类似事件能引起广泛关注、有所成效，是因为事件本身有很强的群众性。外部介入的重要性主要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比较近的事件是2014年东莞的裕元罢工，背后当然有很多学生和NGO支持，但主体还是工人的抗争。对这种群众性事件，政权还是会有所让步。这次事件跟之前一般的状况有所不同的是，佳士有89个工人签名，这个比例并不是太高，而且签名和进行罢工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的群众性基础是有限的，其他工厂工友出来支持也是个别的。2015年比较有影响力的裕元东莞厂罢工后，江西、珠海厂接着罢工，他们的诉求是差不多的，可以引起其他厂工人的共鸣；2010年本田罢工后，有起码一百家汽车零配件厂接着罢工。这样对比起来，这次佳士在工厂内部和外部得到的来自工人群体的支持是不够的。

怀火：所以说，佳士最初发出来的声音和诉求是筹组工会，带来筹组工会诉求的那些劳资矛盾是和其他劳工抗争差不多的，都是建立在经济的诉求上。

陈敬慈：对，但佳士没有一个大的事件引发大多数工人的愤怒。简单地说，在工厂内的群众性有所不足。

那么如何看待佳士运动中具有政治诉求的部分？

怀火：2000年之后有没有比较成功、有影响力的从经济诉求上升到政治诉求的劳工运动个案呢？你觉得相对比较成功的本田罢工算不算是具政治意识的运动？

陈敬慈：对于什么是有政治性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当工人有初步组织工会的诉求就是有了政治意识，这种说法不是错的，但我认为就算这算是政治意识但也是低层次的政治意识。他们仅仅是要求一个民主的工会，但不是要求国家承认工人的组织权利，这是很不同的。本田罢工也主要是经济诉求的，个别工人中当然有政治意识高的，但还没有成为集体的现象。

怀火：不过佳士运动在筹组工会时提出了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方向，之前都是没有的，对吗？

陈敬慈：我理解，高举“社会主义”这类鲜明的意识形态旗帜的是学生和外部支持者，支持的前线工人是有限的。学生和工人的距离太大了，并没有真正连结起来。也因此，我们没有看到有很多佳士工人出来支持学生。目前工人中也只有少数有工会的意识，例如加班费、不要扣工资这些诉求才是工人普遍关心的东西。如果说工厂不给加班费、克扣工资，工人一定会愤怒的，但如果说工厂不让组工会，并不会引起大多数工人的愤怒。过往筹组工会比较成功的个案，很

多是把组工会和其他诉求一起提出来的，而且其他诉求是更加重要和迫切的，政府在处理集体争议时，为避免事件恶化，从满足具体的经济诉求出发顺便成立工会，以最快的方式平息工人的愤怒。

佳士运动筹组工会的群众基础是否不足？

怀火：如果说运动要有一个大的事件才可以引发工人的集体愤怒，那么在工人要求筹组工会之后，米久平等人被开除、被打，算是这样一个事件吗？

陈敬慈：但它的群众基础是足够的吗？如果是群众基础比较强的运动，在工人被开除后，工友们会通过罢工等方法去支持他（例如在本田罢工期间，资方开除两个活跃工人后，其他工人被激化了），这种情况下运动结果是会不一样的。在很多罢工事件我们不容易知道谁是领导，但在不少研究中发现罢工领袖大部分都是基层管理人员或者技术人员，这些人是在工厂里很有面子、有威望的。其他工友会比较支持他，可能因为是他的下属或老乡。这种工人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会让他在工人之间比较自然地成为领袖，解僱他会引起工友们更大的愤怒，也就是会有比较多的群众基础。

怀火：组建工会跟罢工是很不同的，罢工当然需要更多人才可以有力量。在佳士这种一千人左右的工厂，如果有 89 人签名支持组建工会，人数算是不多吗？以大学社团来类比，一万个学生的大学要成立一个社团的话，不需要一万人来

支持，只有五个人也可以，只是影响力大还是小的问题。

陈敬慈：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工会诞生的成功个案，都是大型抗争的产物。比如我们中大的职工会也是因为学校要做一个改革，很多同事搞抗议时顺便把工会搞出来的。香港的说法是“危机介入”，什么时候最可以做组织呢，就是当有危机出现的时候。以前职工盟就会到处宣传自己的热线电话，如果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的公司有什么大的争议，职工盟就会去推一个职工大会然后顺便把工会搞起来。如果没有大型事件的话，即使在有组织自由的香港，组织工会也是难以成功的。就算是在民主国家，僱主都不喜欢工会出现，会找机会打压或分化。平常如果几个人说要组工会，为什么其他人会支持？但譬如说工厂突然要减工资，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很生气，然后会想到为什么老板可以这么欺负我们，可能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会。

在工友基础不足之外，当前整体形势是否适合？

怀火：秋火、区龙宇等人会批评学生不应该把经济斗争盲目地上升成政治斗争，原因是在佳士运动中除了具体工友的支持基础是不够的之外，这个运动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援，这是因为当前的整体工运和社会形势都是处于低潮的。所以他们不只是说这些学生没有成功地调动群众，而是现在本来就不是适合的时机。

陈敬慈：现在的劳资纠纷仍然是在增长的，例如最近有关 IT 工作人员工作时间的 996 争议和送货员的罢工，去年也有大规模的卡车司机和吊车机手罢工。很难说现在是低潮，所以我主要看重的是事件的性质。胡温年代的国家是相对弱势，政治机会确实更大一些。当前国家确实是比较强势，但是强势政府同样害怕群众，只是运动策略上可能要适当地让步，除非群众力量很大，就算政府强，但群众更强。

职工代表大会在现实状况中能否发挥作用？

怀火：有些对于佳士运动的批评认为，职工代表大会就可以在工厂中发挥工人行使权力的作用。他们认为佳士声援者只强调工会是有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运动的参与和支持者是受影响于西方学院养成的劳工研究者，他们有其他政治议程。²

陈敬慈：在我认识的个案中，没有一个民营工厂的职工代表大会有发挥重要作用的。唯一可以讲的是，2010 年的罢工潮之后有很多汽车工厂改选了工会，进行了集体谈判。这些工会是发挥了一点作用的，因为如果劳资双方谈不来的话，工人会搞野猫式的罢工。我对国企没有实证的调查所以不敢讲，但民营和外资工厂中没有看到职代会发挥多大作用。

很多工厂为了满足上级的要求，在书面档上成立职代会和工会，很多是连

²阮欢（2018）〈社运学者卖啥药〉，见“彼时彼岸”，
<https://course5293.wordpress.com/2018/09/19/%E7%A4%BE%E9%81%8B%E5%AD%B8%E8%80%85%E8%B3%A3%E5%95%A5%E8%97%A5/>

选举都没有，有选举也都是形式上的。大部分工厂的选举都是举手通过，不是真的投票。候选人的产生主要是资方暗中在影响，比如不同部门要产生代表，一个车间的主任就会成为候选人。在一般的工厂中都是这样，也没有什么人敢挑战。个别工厂会否做得比较好？肯定是有，但整体现象上都是书面上来发挥作用而已。2010年广东省曾挑选十家工厂做工会直选的试验，工人有投票，也有提名过程。根据这个比例，可以推测绝大部分的工厂的职代会和工会都没有真正的选举机制和效果。有比较好的个案，政府会高调地说这一家工厂做得特别好，学者就去研究它是怎么个好法，这种工厂是很个别的“模范”。

怀火：另一个跟工会有关的问题是，你觉得近十年这些介入集体行动、比较有运动取向的 NGO 工作者，在推动筹组或改组工会的时候，有没有要朝向独立工会的想像？或是聚焦于在体制内工会中改选？或是不管是独立工会还是体制内工会，只要 work 就可以？

陈敬慈：在理念上，有一些人反对在全国总工会体制下、在既有框架底下搞工会，他们认为“工会”都会被全总收编；另外一些人觉得独立工会目前是完全没有空间的，虽然觉得全总有不足的地方，现在只能在基层逐步锻炼工人，让工人逐渐学习，学习的方法是要要在参与中挑战现有的工会制度。具体实践上，以前曾经主张独立工会的 NGO，例如“中国劳工通讯”，这几年主张促进全总的改革，推动集体谈判，鼓励工人参与厂内工会或协助上级工会的协助。我没有听

说目前有人尝试搞独立工会的。

学生进入工厂做组织的话，应该有一个什么位置？

怀火：你刚刚强调进入工厂的组织者跟工厂内自然产生的工人领袖之间的差别，那么学生进入工厂做组织的话，应该有一个什么位置？和工人领袖有什么区别？外部的工作者缺少譬如老乡关系等社会网络，所以需要更多其他方法吗？

陈敬慈：对，需要进一步思考工人工作应该怎么做。去接触、影响、教育工人群体里面的领袖，其实工人间本来就存在着领袖，但这种领袖不一定是进步的，有时更可能被资方收编。外部工作者可以做组织者，不一定要做领袖，要培养和帮助群众里面自然已经存在的领袖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外部工作者本来不是长时间的工人，需要很大的耐性和长时间的委身，才能得到工人的信任。

怀火：你怎么回应那些批评这些学生的介入是菁英主义的？这类批评认为学生作为外部力量注定是不会理解工人诉求的，不会理解工人当下的情感和动力，这次抗争的升级就是菁英主义的后果。

陈敬慈：工人主要还是做经济的斗争，政治意识现在还是薄弱的或者说没有

的。学生则是有比较高政治意识，是学习、读书培养出来的，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政治斗争。而且学生很少有工作经验，对工人斗争和职场关系里面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是完全理解的，所以会有激进化的冲动。

学生当然需要在不同的尝试中学习和改进，但在宏观层面来看，社会的进步大都是靠部分菁英和底层结合，而且一定要靠适当的方式结合。完全靠基层群众虽然有力量，但方向不清楚，容易被瓦解。而菁英自身又是没有力量的，必须跟群众结合，而且要靠有机的结合才可以做得更好。我认为，不可以仅凭学生的身分和出身就认为他们是菁英主义的。

这次事件可以有大批学生，在网路上、在现场组成声援小组，而且来自那么多著名的高校，这是很壮观和值得支持的现象，起码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没有的现象。这种现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情感，没有太多策略上的考虑、会犯不同的错误，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值得分析的是学生为什么会左倾和激进化。

我不认为可以简单地把学生理解成小资产阶级。第一，他们将来会从事什么工作我们不知道，但清楚的是在今天的就业市场，就算名校出来也不一定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可以成为城市里面的中产。第二，这些学生很多就算北大的，有一些本科也不是北大的，是透过本科时期个人努力才进北大；这些学生有一些是基层的小地方或工农家庭出身的，这对我们分析他们的阶级属性有所影响。声援佳士的年轻人有些是在校生、有些是毕业生、部分是其他工厂的年轻工人，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准相对是比较高的，他们的阶级意识在提升、思想意识在向左转。

学生为何会以这样的组织与斗争策略来搞佳士运动？

怀火：关于群众基础和客观形势判断的主要批评是，这些学生在比较高调的抗争中的错误就是错估了阶级力量的对比，也就是高估了群众的支持、低估了打压的力量。高估了群众的支持这一点是有可以检讨的地方，但“低估了打压的力量”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批评？

陈敬慈：如果是 NGO 工作者是不会这样搞的，但学生不同，他们无所畏惧，很纯洁。从他们的成长脉络看这些 90 后没有经历过中国最残暴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激进的行动也是可以理解。我们看待他们应该是依据他们成长的脉络，听说八月份有老师和家长来游说学生回学校，但学生不愿意走。部分老师是比较有经验和长期支持他们的，这里也有一个世代的隔膜，根据不同的人生经验会有不同的选择。但以后要思考新的策略时，要付出多少代价，得到什么东西，都要考虑进去。大家都应该在这个经验里面学习，重新调整步伐。

怀火：佳士学生一开始就广发英雄帖，但收到的回应不只是支持，而是有很多批评。但学生每天都面临很多的紧急事件，在这种状态下很难分辨哪一些批评是正当的，哪些是不相关的，所以会有一个排斥外部批评的状况。这一方面是毛派的组织特性、组织文化的原因，另一方面是高度紧张状态下的原因。

陈敬慈：我对他们内部不是很了解，但我们从一般的道理来理解，一定是有一

些人发挥了有影响力的决策作用。但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的脉络，很难对他们怎样做决策做判断。

我认为目前不论是毛派还是广泛意义上的左派力量都是薄弱的，如果要推动知识分子支持工人抗争的话，需要通过具体诉求扩大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参与。因为事件是不涉及之后是否要走向共产主义的争议的，事件的具体目标，例如工人要组工会，要求释放工人和学生，都是合法合理的。不管什么派别或什么人，只要支持就好。当然在运动内部有一个左翼的核心、左翼有适当的领导权是没问题的，但事件的目标能清晰化的话，比较容易达成，可能政府也相对容易下台。有一个相对成功的例子就是2018年初的八青年事件，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支持，使得政府没有继续追捕。太意识形态化的口号，不利于争取广泛的支持；且事件政治化之后，政府就没可能让步了，让步就等于体制被挑战了。

怀火：在你看来，有没有可能把佳士学生理解成一个类似媒体运动的行动，以此来宣传自己的力量？这些学生似乎在社会上觉得自己领先了一步，希望通过这次行动可以有更多人跟上去，但目前看到的是工人和知识分子并没有跟上去，好像只有潘毅跟上去。

陈敬慈：我在外面观察的话，会认为相对于八青年事件，佳士运动在论述上不够开放。如果开放一点，比如在语言上突出组织工会、释放工人的具体目标，

国内外知识分子才容易支持，特别是国内的支持，因为海外的影响力有限。如果在语言上太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话，国内的知识分子会因为自身安全或者对运动方向的疑惑而不去支持。

我的看法是中国的运动和未来的转变，应该是由国内起主导作用，一些代表性的领袖都应该是国内的。香港当然可以发挥重要的支援角色，但相对优越的位置决定了我们和国内的人做的判断和选择会不一样。

怀火：对于佳士运动的斗争策略和组织状况的反思，也涉及到我们关注的对于运动批评本身的检讨。我们觉得如果是意识形态的批判，比如我是一个自由派，我觉得毛派的运动不论怎样都是坏的，都不应该发生，那我可以在运动进行的时候就进行批判，反正我对运动没有任何的同情。但如果是左翼内部的话，是应该有其他方法的。你觉得外部的观察者对运动的讨论，适合怎么样展开？

陈敬慈：对运动的路线有不同看法是一定的，但这些批评如果提出来后会对正在进行的整个运动有负面作用的话，比如会造成很大的分裂的话，可不可以在运动事后检讨时才提出？如果在运动正在进行的时候，可不可以尽量在内部提出？而且中国大陆跟香港、台湾的情况又不同，如果是在大陆的运动进行过程中做批评的话，会造成的不只是对运动的伤害，还会影响到人脉关系的暴露带来严重的后果。

佳士运动如何可能获得广泛社会支持？

怀火：你刚才提到对近年学生左倾化的分析，在你看来这一波学生的左倾，跟近年知识界（比如社会学、文学和文化研究）中阶级话语的再出现有没有关系？

陈敬慈：是政治经济形势的改变带来阶级话语的复兴，并启发了青年学生。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大家看到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才能解释很多问题，以及看到出路在哪里。如果是纯粹文化的、后殖民主义的、性别的、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但不可以对学术太乐观，目前川普等等这些人已经完全不讲经济全球化了，美国做的也是违背新自由主义的；但新自由主义还是在大学占主导地位的，也就是说知识创造的体制是有阶级属性的。

怀火：在中国的综合性和大学里面，社会学系、中文系、外文系多少都会有西方马克思的课或是读本，但为什么这些学生还是主要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影响？

陈敬慈：他们是在大学的马会中吸收马克思主义，而马会本身是受到正统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影响——不论是课本还是老师的影响，那中国学院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列毛。此外，一些马列毛路线的传统左派团体，会组织学生暑假去做国企工人的调研，慢慢演变为对工人抗争的支持。而文化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很政治性，老师不会指导学生去搞工人调查等等。但未来应该是

会慢慢变化的，有一些原本的自由主义者会向左转，毛派也会慢慢可以改变，很多人自称毛派，内涵可能是很不同的。

怀火：你在谈佳士是否反应了中国会有跟 80 年代韩国学生进厂运动同样的后续趋势的文章〈韩国 80 年代工运引发的蝴蝶效应，会在中国发生吗？〉³中提出，80 年代韩国和现在中国大陆运动的很大不同在于，韩国学生得到相对比较广泛的群体的支持，譬如很多牧师、记者等。

陈敬慈：韩国是从民主运动开始，民主运动时期已经有了广泛的社会支持。民主运动被镇压后，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在寻找新的出路时开始向左转。所以他们是先有民主意识，然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觉得应该到工厂去。而且当初韩国学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相对多元一些，有不同的类别，当然毛主义也有影响到韩国。中国历史背景不一样，左翼学生最先接触的是毛主义，毛主义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得到的支持是有限的。

怀火：也就是说韩国 80 年代跟工人连结的学生有广泛的支持，是因为在此前的民主化运动中就已经累积了广泛的支持，对吗？

陈敬慈：当前的中国是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基础？我觉得慢慢会有的。比如一开

³陈敬慈（2018）〈韩国 80 年代工运引发的蝴蝶效应，会在中国发生吗？〉，见“端传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015-opinion-leftwinginchina-korea-comparison/>

始北京的左派只是关心国企工人，后来才慢慢对南方农民工有兴趣。在南方关心农民工的比较多的其实是自由派，譬如说一些大学老师和学生，他们是在公民社会的语境下支持劳工 NGO 和工人权益。维权律师基于对法律权益和人权的关心，也可能支持工人的维权运动。类似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群体还是很多的，主要是看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怎么和他们保持对话与联系。

怀火：你对运动的群众基础、学生与工人的关系提供了很脉络化的分析，对我们很有启发。再次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